中苏建交的幕后“传言人”

1949年开国大典后仅几十个小时,苏联和中国先后宣布与对方建交。其中,一位名叫谢尔盖·列昂尼多维奇·季赫文斯基的苏联外交官不仅在10月1日当天登上天安门城楼,观摩开国大典,还有幸成为中苏两国建交的幕后“传言人”和“见证者”,并在此后几十年时间内为中苏、中俄友好关系作出许多贡献。不久前,季赫文斯基生前回忆录《重返天安门》问世,回顾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细枝末节。

周恩来向他发出急信

开国大典进行时,贵宾云集的天安门城楼上,外国人只占极少数,真正的外国官方代表仅有一位,那就是季赫文斯基。微妙的是,他名义上还是苏联派驻中华民国政府的北平总领事而已,因为当时中苏双方并未正式建交。就在庆典结束后数小时,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派助手来到苏联总领馆,给季赫文斯基送来一封急信,内容是要求苏联承认新中国并与其建交。

在回忆录里,季赫文斯基详述了这一重大历史细节:“我迅速将其译成俄文,然后与译电员一起将电报发给莫斯科。第二天早晨,值班的管理主任告诉我:‘我刚才收听莫斯科的广播,清清楚楚听到您的名字!’原来,因为时差的原因,我拍发的电报恰好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,他当即下令在中央媒体上进行公布。就这样,苏联于10月2日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”

苏联使团的“全新的命运”

很快,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式与苏联建交。当时,就驻华大使人选问题,不知出于什么原因,苏联政府决定选择在中国待了6年多并一直和国民党打交道的外交官罗申。

罗申先后担任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馆的武官助理、苏联驻华特命全权大使。1949年1月,国民党预感南京不保,极力动员各国驻华使馆随同政府一起搬迁广州,罗申奉命率馆员随国民党南迁,后来才只身回到莫斯科。

身为当事人,季赫文斯基也没想到斯大林会提名罗申“回炉”,带着满脑子的疑惑,他立即拜见周恩来,就新驻华大使人选征询中方的意见。几十年后,季赫文斯基清晰地记得:“周恩来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稍等一会,他本人去了不远处的毛泽东办公室。过了15分钟,他回来告诉我说,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提出的大使人选。”

就这样,罗申从苏联驻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任大使变成驻新中国的首任大使。季赫文斯基马上向国内汇报。10月4日罗申从莫斯科启程,于10日下午4时18分抵达北京前门车站。此时,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等候多时。按照国际惯例,大使到达一般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出面迎接即可。罗申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隆重接待的外国大使。

新的中苏关系也给苏联驻华外交使团带来“全新的命运”。10月20日,被滞留在广州的原苏联驻国统区外交人员终于来到北京,加入罗申领导的苏联大使馆。

在新中国成立头两个月里,苏联就派出援华专家300多名,几个月后就增至数千名,季赫文斯基在回忆录中强调:新的苏中关系完美地拉开帷幕,那是一种真诚的、令人振奋的、世代皆兄弟的友谊。

真诚的友华派

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,季赫文斯基的地位不容小觑。1939年,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来莫斯科访问,见到了苏联高级领导人,全部会谈的翻译正是季赫文斯基。卫国战争爆发后,季赫文斯基承担了繁重的外事任务,于1943年经新疆来到重庆,当上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馆二秘。

1946~1949年,季赫文斯基任苏联在华北的外交代表,负责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事务。1949~1950年,季赫文斯基担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;1968~1974年,他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苏联委员。

季赫文斯基不仅知华,而且是真诚的友华派。1949年底,毛主席首次出访莫斯科,还参加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庆祝,季赫文斯基亲自陪同毛主席抵达中苏边境。

在92岁高龄时,季赫文斯基感慨道:“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做得非常明智,他们坚持基本制度,但同时调动了个人积极性。中国人一边总结经验,一边前进。我认为,这个体制非常灵活。”

中国也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。1999年10月1日,季赫文斯基再次受邀来华参加国庆大典。2018年2月24日,季赫文斯基在莫斯科辞世,享年百岁。 **吴健**

名将朱可夫曾来中国做军事顾问

1937年7月“卢沟桥”事变爆发,战火在中国迅速蔓延开来。随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,中苏谈判才算理清了头绪。1937年8月21日,双方在南京正式签署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》。当时,苏联虽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其迅速对日开战的要求,却也很清楚问题的实质:中国一旦败亡于日本,将对苏联构成莫大威胁,援华势在必行。

为此,苏联开始向国民政府提供武器援助。苏援物资包括近千架飞机、近1200门火炮、大量的枪械、弹药和油料。依靠82辆苏制T-26型坦克以及大量车辆武器,还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兵团——200师。国府高官孙科后来在1944年评价道:“外援方面,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以后,直至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以前,整整四年间,我们作战所需的物资,大部分独赖苏联的援助。”

1937年至1939年2月中旬,苏方还向中国派遣了3665名军事人员(空军人员712人),截至1942年则达到5000人。其中战死186人,失踪9人(基本都是在空战中损失的)。

在苏联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中,包括朱可夫和崔可夫等未来苏德战争的名将。对于苏联军事顾问起到的作用,向来说法不一。只有一点可以肯定:他们不会指手画脚胡乱干预,比后来的美国人更受蒋介石欢迎。斯大林甚至不时地给中国官员打气。 **庆晚**

于右任:我的故乡是大陆

1949年4月20日,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。4月21日,于右任被人从南京转移到上海,随后辗转到重庆,最终在11月29日离开大陆,飞往台湾。但他的夫人高仲林、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依旧留在大陆。一家人,从此再也无缘相见。

1962年的元旦,于右任在台湾“监察院”参加完一次活动后,感到身体不适,便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:“我百年后,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,可以时时望大陆。我之故乡,是中国大陆。” **张玮**

文史杂谈

“笨皇帝”其实很聪明

明朝的皇帝里,极品非常多,笨到极品的,唯独明穆宗朱载垕!

他有多笨?上朝的时候,朝臣们吵得唾沫横飞,他却两眼放空思考人生,天大的国事报来,他都是甩手叫大臣处理,自己躲猫猫!

可就是这么个笨皇帝,看上去稀里糊涂,却使国家焕然一新,经济蒸蒸日上,军事都扬眉吐气,六年的短暂执政,被公认为中国又一黄金盛世——隆万中兴的开始!

他的管理手腕,别具一格,表面什么都不理,其实选对正确的人,担当正确的事,他自己居中拿捏,最小的力气办最大的事。

比如著名的“隆庆和议”事件:军威焕发的大明,把骄横鞑靼打到求和,可仗好打,和却不好求,朝中一干臣子,坚决表示拒绝鞑靼求和,非要死打到底。可看当时情况:鞑靼服了软,和议后还能封贡互市,于国于民都有利,怎么办?

在这个大问题上,朱载垕就做得极聪明,表面不表态,让臣子们放开吵,大家关起门来吵差不多了,他再站出来一锤定音:吵也吵过了,气也撒过了,现在起翻篇,和议正式启动,出事我负责!这一锤子买卖,换来了大明西北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和平!

朱载垕登基后一大重要举措,就是“朝审”,每年霜降时节,复查全年案卷,冤假错案查出一件办一件。头一次朝审,复查之前嘉靖年间四百九十个案子,查出一百三十多个冤案,大臣们都吓坏了,怕这太没面子,朱载垕却坚决:该怎么办就怎么办!

连自己家疮疤都敢揭的领导,如此的担当,想不干大事都难! **张嵚**

历史档案

“火烧东京”成噩梦

1943年,美国在大反攻时制定了轰炸日本的计划,1945年1月底,美军第21轰炸机集团指挥官柯蒂斯·李梅分管了对日战略轰炸。3月9日,李梅下令开始执行“火烧东京”计划。鉴于日本战斗机缺乏夜战设备拦截困难,他在晚间出动了325架B-29重型轰炸机。为了增加载弹量,李梅让轰炸机卸下除尾炮以外的所有武器,全部携带燃烧弹,载弹量从3吨增加到7吨,以小编队多方向进入东京,靠雷达指引轰炸。

据老一代东京市民回忆,这个当时有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在1945年3月9日午夜,遇到了恐怖程度不亚于关东大地震的灾难。空袭警报响起后,市民认为敌机在黑暗中投弹炸不中目标,大多数留在家中。然而,这天夜间在东京上空有多达50万枚重7公斤的小燃烧弹,如雨点般地投掷下来。这种“火攻”的方式对具备完善消防措施且有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官府大楼,以及大工厂的效果有限,而对房屋为木质的居民区有极大的破坏性,百姓大为遭殃。

美机投下的燃烧弹,是刚制成的凝固汽油弹,难以用水扑灭。3月9日夜间投下2000吨燃烧弹时,东京恰好刮起强劲的西北风,一些街区瞬间呈现“火爆”场面,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。不少市民受不了灼烤,跳入市内的河中,没想到河水也被烧得沸腾起来,第二天早上,东京许多河面都漂满了尸体。

3月10日天亮时,东京四分之一的区域即40平方公里被烧成青烟缭绕的平地,26万幢房屋付之一炬,刮大风时迷眼的不是沙子,而是人的骨灰。随后市内发现8.3万具尸体,若再算上失踪人员和葬身于废墟之下的人,估计当夜有10万人被烧死,还有10万人被烧伤,这是世界战争史上因轰炸造成人员伤亡最多的一次。这也成为日本人永久的噩梦。 **李涵**